

逆全球化浪潮：内在逻辑、发展前景与中国方略

□ 黎 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掀起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产生逆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显著超出其增长效应、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失灵”、美国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行为是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根源。尽管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持续泛滥,但在持续科技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尤其是中国的积极推动下,本轮经济全球化非但不会就此终结,反而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对此,中国应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经贸体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新型全球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2)11-0052-10

引 言

经济全球化描述的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状态,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各种质疑及反对。当反全球化的言行影响到各国贸易投资及移民政策,并对时下的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态势产生逆转作用时,便产生了所谓的逆全球化浪潮^①。

随着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对逆全球化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大多数文献重点关注经济全球化运行中的问题,如巴格瓦蒂^{[1]68}、斯蒂格利茨^{[2]91}和罗德里克^{[3]8}等,学者们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劳工妇女权利、公共治理缺位等问题,也分别给经济全球化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区别在于,巴格瓦蒂和斯蒂格利茨态度相对温和,而罗德里克提出了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三元悖论”,认为逆全球化浪潮的产生有其内在必然性。对于逆全球化浪潮,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围绕收入分配探讨逆全球化浪潮的成因。如Harrison等^[4]、Helpman^[5]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关系,强调国际贸易是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并非主要原因。盛斌和黎峰^[6]对传统全球化下的收益、理念、规则与模式进行了反思。江时

作者简介: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通常认为,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第一轮逆全球化浪潮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并于“大萧条”期间达到顶峰;20世纪50年代起,人类迎来了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然而,在两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先后爆发了两次逆全球化浪潮。一次发生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另一次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

学^[7]以经济全球化的阻力作为切入点,探讨了逆全球化的根源。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逆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逻辑、中国的应对方略及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前景。与既有研究相区别的是,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及演绎归纳方法,探讨经济全球化及逆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般规律。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其运行机制两方面,剖析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内在逻辑。其次,围绕经济全球化是否就此终结,对本轮逆全球化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思路。

一、逆全球化浪潮的缘起及其内在逻辑

逆全球化浪潮,从本质上讲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否定及抗争。因而,应从两个方面追溯逆全球化浪潮的起源,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二是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本身。

(一)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优化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极化效应,即国家间发展水平及各国阶层间收入分配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①,成为推动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国家间收入分配方面,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表明,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优势融入国际专业化分工,各国均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然而,该理论主要强调国际贸易的增长效应,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不对等^[8]⁸³。在产业间分工条件下,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差异决定了随着贸易规模扩大,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将不断改善,而发展中国家因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将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尴尬,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中心—外围”发展格局。在产品内分工情况下,发达国家凭借着技术及营销渠道优势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定位在加工制造环节,甚至遭遇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9]。类似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将由投资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发达国家得到更高的投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获得其国内发展所稀缺的资本要素。然而, Lucas^[10]发现国际资本的主要目的地并非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而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开展,国家间收入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加速国内经济改革和贸易投资自由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出口增长和国际竞争激活国内闲置要素,积极利用外资以吸引国际生产供应链的集聚,有效带动了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阵营也出现明显分化^②。

其次,在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方面,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表明,国际贸易将带来各国要素价格均等化,即发展中国家劳动要素报酬增加导致国内收入分配更加均等,而发达国家则出现劳动要素报酬下降、国内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劳动要素流动性较差,在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条件下国内劳动将变得更容易替代,一旦面对廉价劳动密集商品的进口冲击往往陷入降薪甚至失业的困境。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加速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国际生产外包,在有效整合全球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大量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

^①严格来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诱因是技术进步,但经济全球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 O'Rourke 和 Williamson^[11] 的估算,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经济全球化的解释力在发达国家约为23%,在发展中国家约为30%。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解釋力在发达国家为50%左右,在发展中国家约为40%。

^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开展,以中国、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反观最不发达国家,即使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仅仅达到1500美元,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可见,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好比一把双刃剑。人们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红利,包括先进技术传播、品种多样的廉价商品和服务、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跨国传递、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当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增长效应足够大时,其倡导的市场开放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理念将日益深入人心。而一旦经济全球化“红利”大幅缩小且不足以掩盖国内收入分配问题时,将激起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失望与不满,该抵触情绪又往往被左翼及右翼民粹主义者加上政治烙印,从而形成席卷全球的逆全球化思潮。

(二)经济全球化的运行“失灵”

当前全球化运行的内在机制及目标存在难以兼容的矛盾与冲突。实施统一监管规则、执行极低的关税、放开资本流动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但也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自主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弥补民众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概念构建的当代世界体系中,资本、政府和社会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而最多只能在三者中取二^{[3]153}。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的三元悖论折射出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若干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重全球治理轻国家政策。全球化条件下,气候环境、反恐及安全、疾病防控、金融监管等共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和偏好多元化的民众需求,全球性监管机构和发达国家试图以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特征的一套共同规则推行到世界各国,而忽视了各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自由^{[2]42},由此必然导致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国内政策空间受限的矛盾。

二是重效率提升轻结构转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提升意味着高级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出现所谓的“有增长、无就业”现象。此外,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达国家大规模将国内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必然进一步恶化国内就业形势。

三是重自由贸易轻公平贸易。一直以来,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旗帜推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而对于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纺织品、食糖等商品却仍保持配额。另一方面,贸易投资一体化与“边界后措施”市场规则缺失的矛盾凸显。各国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内政策标准缺乏统一,在双边贸易中往往被冠以“社会倾销”的罪名,因而国家间社会制度及规制的矛盾与冲突,很大程度上通过贸易形式体现出来。

四是重福利国家轻创新国家。通过扩大政治和社会权利、对市场实施管制、建立提供广泛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资本主义的波动性和破坏力。然而在科技大爆炸时代,技术进步势必造成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从而加重社会保障负担,由此决定了福利制度与创新激励的不相容成为福利国家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五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蓄势待发、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制造业的前景将越来越黯淡,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以此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明智之举。然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往往导致国内市场机制、行政效率及法律效力等方面相对滞后,由此引发制造业升级需求与国内软实力及营商环境不足的矛盾凸显。

六是重“刺猬”轻“狐狸”。相对于盲目推崇市场及自由化的“刺猬”,“狐狸”更加务实地主张因地制宜地设计更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制度,实现发展模式多元化^{[3]213}。然而长期以来秉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刺猬”们固执己见地推销单一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症下药”,反而成为部分国家(如俄罗斯和阿根廷)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根源。

七是重利益轻理念。人类是思想观念的奴仆,思想桎梏常常成为制约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主要瓶颈。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及对事物运行规律的认识,理念的改变与创新能够拓宽基于利益的分析框架和政策空间。然而正如精英人士会因担心政治权利旁落而反对经济改革,在以专业化分工及市场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氛围中,制度变革往往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阻碍而陷入死结。

可见,在一波波逆全球化思潮面前,全球化的“罪状”可归结为:整合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步伐过快导致技术进步的收入极化效应被加倍放大,而全球化发展模式、治理机制的教条和单一,在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国内宏观调控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操作空间^[6]。

(三)美国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着其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主导建构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及产业梯度转移推动了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然而必须看到,经济单边主义一直是美国应对各种反对声音、直接打压竞争对手、寻求和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由此也成为逆全球化浪潮的起源。

面对着国内“去工业化”和进口贸易带来的收入极化效应,美国政府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采取“以邻为壑”手段蚕食贸易伙伴的分工收益。如在“美国优先”口号下,以所谓的“公平贸易”为由,否定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客观差异,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肆意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歧视他国产品,掀起大规模贸易摩擦;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正常的跨国资本流动^①。此外,频频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消极抵制多边经贸体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第二天,美国便单方面高调宣布退出由奥巴马政府倡导签署的TPP。不仅如此,美国还接连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组织。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并没有切实履行与其经济大国相匹配的国际义务,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真空”,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运行“失灵”。

二、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及前景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白领阶层对贫富差距扩大^②的不满情绪日增,民粹主义右翼势力乘势掀起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12]。

(一)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

1. 发达国家加快“再工业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及外包将国内生产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梯度转移,“去工业化”不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也成为发达国家充分整合全球资源、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深受虚拟经济泡沫伤害,使其意识到重新建立一个健康的制造业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奥巴马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刺激实体经济政策方案以推动“再工业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领域,其重点在于制造业里最高端、附加值最高的领域,尤其是大型、复杂、精密、高度系统整合的产品^[13]。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2014年8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108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

^①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历年外资安全审查报告,2005—2008年审查外国投资交易案例468起,其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案例37起,占比仅8%。2009—2015年期间审查的770起案例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达到310起,占比陡然提高到40%。

^②在发达国家,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富豪手中。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统计显示:1995年以来,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了世界财富的38%,其中占世界人口万分之一的大富豪的世界财富占比由1995年的3%增长至2021年的9%。另一方面,最贫穷的50%人口只分享到全球2%的财富。

司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将其部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2010—2013年美国回流企业中,从中国撤回的企业数占62.4%,包括通用电气、福特汽车等世界500强大型企业^[14]。

2.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不断^①。2017年8月,美国政府以所谓“强制技术转移”为由,单方面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基于该调查结果,2018年3月23日,美国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4月3日,美国公布500亿美元1333项的对华商品加征进口关税清单,由此推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除了大规模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外,美国还积极利用“非市场经济问题”及“232调查”等手段,对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加征关税和实施打击。如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售芯片与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同年9月,美国最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生产商美光(Micron)在美国加州起诉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指控其偷取其商业机密,并据此限制对其提供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2020年2月13日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华为提出指控,罪名之一为“敲诈勒索与合谋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尖端科技”,并以此为由开始全面停止对华为的芯片供应,打压其技术创新行为。

3. 发达国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面对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强劲的出口竞争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通过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加以遏制。为此,美国先是积极构建排除中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继而按照TPP标准签署新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与欧盟、日本积极开展三边贸易协定谈判,对国民待遇、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争端解决等多个议题做出突出“竞争”理念及西方制度特征的规定。不同于更多体现市场准入及“发展”理念的第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第二代国际经贸规则更多强调以制度融合为特征的“竞争”理念,企图用市场体制差异及更加严格的竞争标准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

总体而言,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蓝领阶层为主力军的第二轮逆全球化浪潮不同的是,曾经的全球化旗手、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转身成为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推动者,意味着反全球化的浪潮已由发展中国家扩散到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内由低收入阶层扩大到中产阶级。

(二)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前景分析

19世纪70年代起,人类历史迎来了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日新月异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推动下,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持续深入开展。在此后的30余年里,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加之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各国经济关联,最终宣告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终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及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推动下,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同样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连续两轮逆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从发展中国家延伸至发达国家,由低收入的蓝领阶层蔓延至中等收入的白领阶层。尤其是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折射出全球供应链的布局调整、经济大国的经贸之争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值得深思的是,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否足以终结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本轮逆全球化的发展前景如何?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来看,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工业革命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即使处于贸易摩擦不断、各国经济衰退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下,科技革命的步伐并未中断。很大

^①采用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T)中的反倾销数据,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数量为例,从2008年到2015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例为年均103.9起,大大高于2001—2007年间的年均51.7起。

程度上,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是毁于各国的保护主义思想、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导致的市场分割。相对于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各国高度一致的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理念及相关政策。此外,交通和通讯技术进步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是否衰竭;二是是否有潜在的新动能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

1.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是否衰竭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开展,客观上需要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及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足以克服国家间的地理距离。为尽可能地压缩流通成本及交易成本,有效的途径通常包括两个:一是以技术层面的突破促进交通运输及通讯模式的更新换代;二是以政策层面的创新降低各种人为的贸易投资及移民壁垒。

(1) 技术层面

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重点的技术革命不断取得突破,交通运输及通讯技术也突飞猛进。

首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得交通运输方式焕然一新,主要表现为:一是高速交通运输化。近年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超音速飞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接近40万公里。铁路总长度达到10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接近4万公里。在高速铁路网络日益完善的同时,运行速度不断刷新,这极大降低了区域间货运和客运成本。二是交通运输重型化。重载汽车、重载铁路、大型运输机日趋重型化,管道运输的管道口径不断增大,运输能力大幅提高。重型化在船舶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载运散装石油或成品油的大型或超大型油轮,可装载30万吨以上的原油,目前世界最大的油轮可达55万吨级^[15]。三是交通运输一体化。随着以大容量、低成本、互联互通为特征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日益凸显,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实现深度协同和融合发展,如多式联运、江海直达运输等。四是交通运输科技化。一方面,超级高铁、磁悬浮轨道交通、无人航空器、超高音速飞机、自动水运船舶等现代交通运输装备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及运输组织模式、商业模式、治理模式的创新。

其次,21世纪以来,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推动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1G)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主要基于蜂窝结构组网,直接使用模拟语音调制技术,传输速率约2.4kbit/s。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2G)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采用更密集的频率复用结构技术、智能天线技术、双频段等技术,极大提高了系统通话质量,数据传送速率可达384kbit/s。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恰好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智能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提供前两代产品不能提供的各种宽带信息业务,其传输速率达到2Mbps。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是集3G与WLAN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的技术,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此外,4G在价格计费方面更加灵活机动,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确定所需的服务。2019年,移动通信技术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人类进入了5G(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时代。5G是对现有无线接入技术的技术演进,以及一些新增的补充性无线接入技术集成后解决方案的总称。5G以融合和统一的标准,提供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高速、安全和自由的联通。此外,5G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远远高于以前的蜂窝网络,最高可达10Gbit/s。

由此可见,尽管两轮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全球交通运输及通信技术创新步伐不仅没有放缓,反而以更为迅猛的势头深入开展,技术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并未衰竭。

(2) 政策层面

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大陆地区廉价农产品冲击之下,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率先提高进口关

税以保护国内农业经营者的利益,并很快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连锁反应。一旦“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思想战胜自由贸易理念成为主导,势必导致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及经济制裁,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结。

与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近年来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中美经贸争端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特征的逆全球化浪潮持续高涨,但其重点是针对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并没有迹象显示出全球范围的保护主义盛行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市场分割现象。

首先,从关税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世界层面所有产品的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和加权平均适用税率仍呈现出下降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前的2017年,世界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为4.17%,而加权平均适用税率仅为2.59%。尽管此后美国大幅提升对华进口关税,但并没有影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税政策。以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为例,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日本的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水平由2018年的3.19%、3.03%大幅上升为17.94%和11.32%,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其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水平从3.09%增长至7.24%,但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明显抬高关税壁垒。重要的是,经过短暂的大幅上扬后,2020年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最惠国加权平均税率水平分别迅速回落至2.56%、3.23%和3.16%,这表明各国(地区)的关税水平又重新回归正常水平。

其次,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谈判一再受挫,经济全球化步伐陷入停顿,但各种双边经贸协定的蓬勃发展大大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为例,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RTAD)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区域贸易协定发展态势迅猛,即使遭遇到两轮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区域贸易协定规模也保持了加速增长,到2020年,通告的RTAs累计数量达574项,其中生效中的RTAs累计数量为353项。

综上所述,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其推崇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理念。

2.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随着服务与制造环节的日趋融合以及数字革命的不断深入,数字贸易及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在深刻改变着国际分工及贸易模式的同时,给经济全球化增添了新动能。此外,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推动者。

(1) 国际贸易分工新形态

伴随着计算技术进步、通信革命、数字化和大数据的兴起,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广泛使用基础上,电子商务正蓬勃发展^①,由此也深刻改变着国际贸易分工。

首先是贸易模式的改变。传统贸易条件下,进口商直接或通过代理商间接向制造商(供应商)下订单,后者则遵照订单要求按时完成并通过海运等运输方式完成交付。而在数字贸易模式下,进口国消费者(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直接购买国外货物或服务,货物产品由出口国在当地的海外仓发货,服务产品则直接通过线上传输完成交付(如远程教育)或现实交付(如旅游住宿餐饮)。数字中介平台的出现,不仅能为消费者(企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而且能有效消除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支付、信用担保、物流跟踪、纠纷仲裁等服务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极大地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尤其是随着3D打印等新型技术创新了未来商品制造和交付的形态,实现了直接通过从互联网下载的数据文件在本地生成物理对象,降低了对中间生产环节以及库存、

^①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2—2016年期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年平均增长率为11%,2016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到27.7万亿美元。

仓储、分销、包装的需求,使“数字传输、本地生产”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货物贸易的新模式,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超链接”时代^[16]。

其次是贸易结构的改变。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人们对计算机、互联网及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需求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推动了电信、音频和视频,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电子元件等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贸易规模。基于数字技术的线上交付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场所不能分离的特征,极大促进了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务贸易发展。

再次是贸易主体的改变。新新国际贸易理论表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存在高昂的固定成本,相对于低效率企业,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多从事出口贸易。在数字贸易模式下,数字中介平台为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互联网平台接入、商品展示、接收订单的渠道,大幅度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面临的固定成本。另一方面,数字中介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快速与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的途径,进而提高了消费者对中小企业出口商的认知程度。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众多中小微企业得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①。

(2)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力量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工作,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不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面对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涌动,中国身体力行地仍一贯主张、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积极参与与双边及多边经贸谈判、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中国积极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同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协议,共同展开了2000多个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18]。与此同时,中国主动与东盟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谈判并最终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作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RCEP覆盖人口超过35亿,经济总量达到2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RCEP的成功签署极大推动了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阻挡了逆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和扩散。此外,中国正积极与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就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开谈判,再次表明了中国坚决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对抗逆全球化浪潮的坚定决心。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并倡导以发展为导向、强调包容性增长、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全球化。包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共同目标,以“互利共赢”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平等和开放”作为全球治理的组织模式,以“合作与对话”作为全球治理的运行方式^[19],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倡导尊重主权、发展道路与政策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全球化的运行“失灵”,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革命对交通运输及通讯成本的影响、对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颠覆不亚于18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和19世纪的电力革命,数字贸易对于国际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是堪比价值链贸易。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及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将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动能^②。而作为多边贸

^①按照Lendle等^[17]的估算,在美国制造企业中,约有18%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在数字平台上,大部分卖家为出口企业。以易趣(eBay)平台为例,商品出口商约占其卖家总数的85%。

^②事实上,在经历一轮持续快速下跌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在2021年均实现了大幅反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2021年全球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到约28.5万亿美元,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增长了13%和25%。此外,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2020年增长77%,从9290亿美元增至1.65万亿美元。

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方面的贡献日益增强,尤其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及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行稳致远。

三、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转嫁国内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矛盾,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在国际经济领域,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以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加快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美国对华掀起大规模贸易摩擦并在经济科技各方面打压中国,发达国家主导制定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试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

探究逆全球化浪潮的起源,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其运行机制本身着手。在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初,全球范围内技术溢出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往往激发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与此同时,要素流动及交换又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极化效应。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创造更多人类财富的同时却导致了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直至将其彻底“埋葬”。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本身天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和矛盾,追求超级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在现行经济全球化运行体系下,逆全球化浪潮看起来无可避免。就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的走势而言,技术革命及区域一体化趋势并未减弱,数字贸易发展方兴未艾,尤其是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和坚定维护,本轮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就此而终结。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坚决抵制逆全球化浪潮,以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尤其要积极宣传推广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治理的中国经验,为完善现行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首先,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中国应紧抓与韩国、意大利等国签署“一带一路”共建协议的契机,以西欧国家及亚太地区为重点,努力扩大“一带一路”共建“朋友圈”,提升新兴市场的供给和吸收能力。与此同时,仍应基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主动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及亚太地区的双边及多边自由经贸协定谈判,稳定和巩固在传统市场的份额。

其次,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应积极参与并签署高标准的双边及多边国际经贸协定,通过对其中高标准条款的承诺履行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对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国内体制机制的“制度冲突”,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此外,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加紧制定统一规则,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大力实施并积极推广“中国标准”,为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贸新规则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对于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中国应坚决维护以WTO框架为核心的多边经贸体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多边主义发展,巩固多边主义的平台建设,完善多边合作机制,为推进多边主义提供中国方案。与此同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应以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广泛发展同所有参与国的友好合作,充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民生项目,真正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经贸合作样板。

第四,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新型全球化。中国应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紧密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中等收入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践行符合发展中国家

诉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趋势的新型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新型治理观。同时要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议题的相关规则构建,积极宣传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治理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捍卫全球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全球化及其不满[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 [3] 丹尼·罗德里克. 全球化的悖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4] HARRISON A, MCLAREN J, and M S MCMILAN. Recent findings on trade and inequality[EB/OL]. (2010-11-01)[2022-07-24]. <https://www.nber.org/papers/w16425>.
- [5] HELPMAN E.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EB/OL]. (2016-12-01)[2022-07-24]. <https://www.nber.org/papers/w22944>.
- [6] 盛斌, 黎峰. 逆全球化: 思潮、原因与反思[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2): 3-15.
- [7] 江时学. “逆全球化”概念辨析——兼论全球化的动力与阻力[J]. 国际关系研究, 2021(6): 3-17.
- [8] 张幼文. 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9] 卢福财, 胡平波. 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10): 23-32.
- [10] LUCAS R.E.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 27-50.
- [11] O'Rourke K H, and J G Williamson. 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 37(3): 163-190.
- [12] 丹尼·罗德里克. 贸易的真相[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13] 沈坤荣, 徐礼伯. 美国“再工业化”与江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 江海学刊, 2013(1): 219-226.
- [14] 余珮. 美国再工业化背景下中美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比较研究[J]. 经济学家, 2017(11): 88-96.
- [15] 徐飞. 世界交通运输的发展趋势与挑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4): 78-84.
- [16] 盛斌, 高疆. 数字贸易: 一个分析框架[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8): 1-18.
- [17] LENDLE A, SCHROPP S, VEZINA P L, and M OLARREAGA. Ebay's anatomy [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21(1): 53-68.
- [18] 蔡昉.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N]. 经济日报, 2021-06-12(4).
- [19] 盛斌, 王璐瑶.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J]. 江海学刊, 2017(1): 83-87.

(收稿日期: 2022-09-15 责任编辑: 李俭国)

Anti-globalization Wave: Internal Logic,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China's Strategy Li Feng

Abstract: Since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et off a new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What is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wave? What i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is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How should China respond? Focusing on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come polariz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bviously exceeds its growth effect, the "failure"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unilateralism of the US governmen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wave. Despite the ongoing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driven by continu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specially China, this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end, but will deepen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open, inclusive, balanced and win-win. Therefore, China should promote deeper and higher level of two-way opening-up and improv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opening-up, exp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steadily and align ourselves with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practice multilateralism actively and uphold the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advocate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ti-Globalization Wave; Internal Logic